“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确立了组织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进行运动的基本方针。各地工人在中共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对于如何在工人群众中加强党的宣传教育问题,罗章龙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会议上提出“创办新刊物,介绍各地工人运动和经验”的建议,得到一致赞同,大家当场捐款80多元。李大钊说:“最近可再拿出50元,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北大印刷厂工人设法弄来一些廉价纸张,并承担印刷任务。报纸经费还得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各地工会、俱乐部多方支援。

1921年7月24日,《工人周刊》在以李大钊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领导下于北京创刊,主办者是邓中夏、罗章龙等,重点报道各地产业工人特别是华北地区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注重结合工人阶层的社会境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夏季,《工人周刊》正式转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1924年2月,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报纸又转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

《工人周刊》为4开1张,后改为8开单张,主要在北方铁路工人中发行,首期试刊印刷1500份,一般发行量为2000至6000份。该报每周日出刊,辟有《调查》《评论》《特载》《工人谈话》《工人之声》《劳动新潮》《工人常识》等栏目,为非卖品,读者对象主要为劳动阶层,因此多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内容,文风讲究从实际出发,笔触犀利,体裁自成一格,每有重要文章,均经编委会成员集体讨论才得以发稿。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王复生、王德三、王有德等人分别主持该报法文、德文的翻译工作。

《工人周刊》在社会下层民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摘登《共产党宣言》等内容,让读者了解近代国际工人运动历史,还有反映工人日常生活境况和香港海员罢工情况的内容。对于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罢工事件,该报进行了长期报道。

作为中共党组织在北方的主要报纸,《工人周刊》自发行以来,以指导工人斗争和进行阶级教育为主要目标,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逐渐成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代称”。1926年,由于北方局势日趋严峻,该报被军阀政府查封。 □贾晓明

遇见地坛,遇见史铁生

2010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我与地坛》以同名文章为首文,并又以《想念地坛》和《扶轮问路》为终,是对史铁生59年生活与写作的沉淀与回顾。

1 地坛与史铁生

地坛之于史铁生是根性的。这种根性源于地坛地理上的确定性。“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这座废弃的古园在地理上与史铁生的生活范围重叠,“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这种地理上的切近性,是地坛成为史铁生生活部分的天然条件。

地坛是史铁生写作的原点。地理上的地坛曾经是史铁生生活的中心,史铁生立足于地坛省察自我、管窥世界,细观他者,从而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史铁生的诸多作品都是基于地坛这一生活原点向四处辐射的蔓生性观察和创造性的写作。

2 遇见地坛

在史铁生看来,地坛不仅是地理上某个确定之处,它还是一座充满生机的自然世界,更是一个饱含着悲欢离合的生活场。

“满院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蜂儿、蚂蚁、瓢虫、蝉蜕、露水……“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这是自然的地坛。

这也是人的地坛。晨昏定省时穿梭、行走、生活与地坛空间的人们,这其中有家人、医生、邻里、朋友,以及那些每每相遇又错身而过的熟悉的陌生人。史铁生也在地坛之中。

在这一层面上,地坛在地理确定之外延展出市井生活的复杂与温情。在史铁生的书写中,地坛具有了新的内涵,它是承载人间悲喜与人生彻悟之处,是包容且有温度的生活场。那些在史铁生颓唐岁月施以援手,给予温存,给予陪伴、关怀与爱的人们,组成了又一个地坛。“我”受之于地坛。地坛的时空中承载了不幸与苦难,但也从不乏温情。

地坛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给了史铁生心灵的舒解与照拂,也给了他大量的写作素材,他凝视深渊的眼睛得以望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与人生,对于史铁生来说,地坛是他低谷时的徘徊,却又是他获得救赎的所在。它是史铁生人生的见证。如此,地坛的主体性得以凸显。地坛是能动的,不断地给他回应与给养,促使他思考,并可以从中汲取力量,获得希望。

3 遇见史铁生

正是在这样的一处所在,老树、荒草、颓墙,让史铁生得以默坐、呆想,推开纷乱的思绪,窥看心魂。史铁生把一切融灌进作品之中,我们得以看见并遇见。

自我观照与生命的追问。史铁生在地坛的静谧与陪伴下不断地自我观照,追问生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事就是怎样活的问题”(《我与地坛》)。他在《好运设计》中,最终将生指向不可剥夺的精彩过程。一切的终点既然是死亡,那么就让生的过程变得“美好与精彩”“美丽与悲壮”。这不是一场逻辑的胜利,这是与苦难面对面,跟死亡较过劲的人的领悟。

他在地坛的静默中不断地追问自己“如何活?”写作可以活着,为了写作也要活着!但在为了写作而活着的史铁生获得成功、声名后,他真切地触及到欲望,并感到自由被裹挟,感到慌张。写作和活着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为了写作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写作?在《我与地坛》中,他把活着就要写作作为一个笃定的回答。

生的方式在写作中达成,对于史铁生来说,写作就是活着,就是对生命的追问与回答,写作的过程就是活着的过程,就是达至幸福的过程。

4 “我”观世界

在史铁生的作品中,他习惯于以“我”为人称的书写。到处都是“我”,“我”代表了某种贴近现场的真实,一切观察都在“我”的视角里。只有在“我”之中,才能同“我”一起体验、观察和思索。所以,阅读史铁生,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我”的存在,甚或渐渐成为“我”,像“我”一样思考。

外观与内省。在“我”的讲述中,会遇见生活在地坛场景与群落中的父亲、母亲、善良的邻人、熟悉的陌生人;会一同经历与度过他记忆中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至老年,甚至是病痛;也要面对他的亲情、友情、爱情,体会这悲欢离合……如在追忆母亲的文字中,“我”既在“我”中,又仿佛跳脱出“我”,审视“我”,而“她知道”“她料想”“她想”这样的表述,与其说是史铁生对母亲的猜想,莫不如说是“我”对母亲情感的深切体察。

真切并浸润。史铁生坦率地说起他的痛苦、绝望、无法排遣的委屈与气闷,细致地刻画他生活场景里的人的悲喜、无奈、尴尬、卑劣、悲壮。尽管他一旦想要描述某些景致,便会产生出奇的美感,但在和盘托出这无常世界的时候,他却始终能保持一种平易的家常。“我”始终真实坦诚地吐露心声,从无矫饰,那些个“我”尽管带着强烈的“我”的色彩,却只是让人感受到真切,那些隐藏在生活中的曲折与隐匿,那些沉默与喧嚣,那些人所看不见的爱、挣扎、奋争,他目光所及,描述之至,便以“我”的方式感染、打动、浸润人。

他即是“我”,要引着人去认识这世界,认识这人生。“我”即是人,每一个在“我”的视角下观世界的人、被“我”打动的人,也正是内里同“我”一样的人。如此,才会共命运、同悲喜。这不是史铁生一个人的独白与追问,这本应是人所共有的执著,这本应促使人活在这世间,不浑噩,不混沌。这是史铁生的体悟,这是史铁生的提醒,这也是史铁生的企图,他平静的讲述背后,是他强大的意志力。他对世界与人生的思索与追问也由此灌注人心,有痛苦,但清醒。

遇见史铁生,便要遇见追问。他不断地在作品中问自己,问世界,问人生。问得急迫,问得恳切,问得挚诚。他的思考和写作愈发的深沉。正如《扶轮问路》中,他言道,“未来的路途一样还是无限之问。”于史铁生而言,这追问也正是他喷涌不断的生命力量,是他存在的意义与过程。

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一文中写到,有人曾去地坛找他,甚至也想要去地坛寻找安静。但史铁生的回应是,如今的地坛已今非昔比,安静不在。但于他而言,与其去地理的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回到精神的地坛。“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引自《我与地坛》)。此处的地坛,在史铁生处已脱去了物的属性,它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和史铁生的精神与意志合至一处。那是“我”记忆中描写的地坛,是“我”的生命体验与思考铸就的地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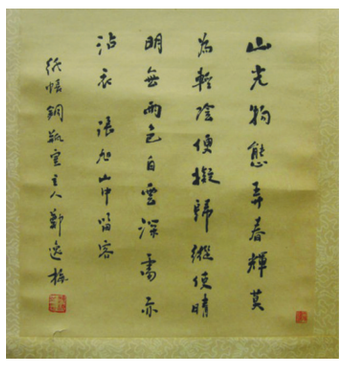
史铁生与地坛融于一体,是天地间的存在。不是地理的、肉身的,而是精神的、意志的。这是《我与地坛》的意义所在。这是我们遇见的史铁生。 □王彤

■往事

无白不郑补:郑逸梅早年报坛生涯

爱读书报的朋友,很少有不知道“补白大王”郑逸梅的。所谓“补白”,就是填写报纸版面的空当。从前的报纸,铅字排版诸多不便,字数长短,锱铢必较,待版面大致拼成七巧板的样式,最后留下的空白,若有大小相称的一篇文字填入,那就天造地设,大功告成了。所以对编辑而言,大块头条的文章固然重要,精悍短小的文字也同样可喜。而郑逸梅先生最擅写的就是小品,据说以前编辑版面即将排好,将留下的一块空白告以字数,郑逸梅往往援笔立就,毫厘不爽。

其实,早在郑逸梅很年轻时,“补白大王”的桂冠就已经戴到了他的头上。那时他才二十来岁,因平时爱读《世说新语》之类的笔记小说,自己也喜仿照那种文体,写些文史掌故、名人轶事的短文,常为沪上《小说丛报》和《小说新报》等撰写补白短文,几期写下来也颇受读者欢迎。或许,过去的掌故轶事,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新闻八卦”。“八卦”人人爱看,短则数十字,长则三五百,一气读来既不费力,又生动有趣。于是,当时的小说家徐卓呆、姚民哀就戏称他为“补白大王”,而且,每当报刊上有“缺口”,则首选他来写,故又有“无白不郑补”之说。说来也是,自从“大王”的徽号加上,郑逸梅从此笔耕不辍,虽为小品,然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在将近八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留下了煌煌千余万的文字,果然无愧于“大王”之桂冠。



郑逸梅原名鞠愿宗,1895年10月生于上海江湾,父亲鞠震福,母亲郑瑞娥,家中以经营米业为生。其三岁时因邻居失慎酿火而殃及左右,故家室被毁一空,同年父亲又病故,不得已,只得寄居苏州外祖父郑锦庭家,过继于已故舅父郑国龄为嗣子,改姓为郑,名愿宗,字际云,号逸梅。

郑逸梅少时颖慧,嗜爱读书。而其真正走上写作之路,应该是他的中学阶段。据郑逸梅的回忆文章说,他爱好读书,自己购买的第一本书是《吴梅村词》。其实当时的郑逸梅并不了解这位明末清初的大文人吴梅村,听都没听过。他只是看到书名中有一“梅”字,马上就有了好感,并认为一定是一本好书,于是当即买下。后来他出版的第一本集子,就叫《梅瓣集》。不仅与他的名字有关,或许还是为了纪念最初的那一本引他入门的藏书。郑逸梅十七岁时考入的是江苏省立二中,即苏州著名的草桥中学。这所中学素以人文特色见长,教师有胡石予、程仰苏、程瑶笙等,皆一时硕彦。培养出的学生后来成为名家的如顾颉刚、吴湖帆、叶圣陶、王伯祥、江小鹣、范烟桥、蒋吟秋……当然,还有郑逸梅。就一所地方上的中学能有如此建树,那已是非常了不起了。郑逸梅那时融入其中,已经对读书写作有了很大痴迷。作为一个中学生,他经济并不宽裕,实在也买不起什么好书。好在读书成绩优秀,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学校里也不发奖学金,用“购书券”来代替。后来,郑逸梅就用购书券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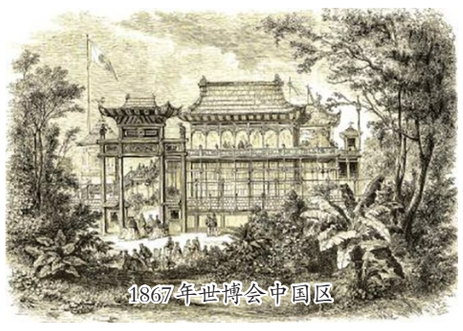
王蕴主编的《小说月刊》,反复阅读,并试着写随笔投稿,终于逐渐步入文坛。民国之初,其时许多革命报刊均以“民”字为名,诸如《民立报》《民权报》《中华民报》等,其中以《民权报》的言论最为锋利,副刊的文字晓畅活跃,也最受读者欢迎。一次,正逢《民权报》副刊征文,尚在草桥中学念书的郑逸梅,就将英文课本上的一篇随笔译出,取名《克买湖游记》寄了去。不料才没几天,文章便刊登出来,还被列为甲等稿,不仅立致稿酬,编辑先生还专门附信赞之曰:“如此文章,多多益善。”这给了郑逸梅莫大的鼓舞,此后则一写再写,热衷于投稿了。后来《民权报》被封更名为《民权素》月刊,郑逸梅又每期撰一篇小品文,编辑还为他设了“慧心集”专栏名,连载多期。若论之,此“民权”系列,乃郑氏涉笔投稿报刊之始,由此,他的写作生涯以及与上海报刊的渊源则发轫启行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文人荟萃,文坛热闹,所以报纸杂志也异常兴旺。那时沪上三鼎足的日报有《申报》《新闻报》《时报》,而他们的副刊为了争取读者,都是请来大名家主持,如“自由谈”的黎烈文,“快活林”的严独鹤,“小时报”的包天笑,皆响当当的报界大佬、文坛大咖。副刊在他们的主编下有声有色,深受读者喜爱。而杂志则季刊、月刊、十日刊、三日刊甚至每日刊都有。由于郑逸梅擅于短什小品,颇得各家青睐,故编辑纷纷请其撰稿,有的长期约稿,有的开设专栏,如此,以前热衷自己投稿的郑逸梅,后来则是应接不暇,除了上述报刊外,还有《明报》《新新日报》《上海繁华报》《笑画》《最小报》,以及《心声》半月刊、《快活》旬刊、《星光》杂志等,几乎上海滩的大多报刊,都可见“逸梅”的文章。其实,郑逸梅的主要职业是教书,他任过中学、大学的教职数十年,写作只是副业。然而由于他下笔勤快,见报频繁,每月时有数万字出笼,副业早已超过了主业,所以,朋友都戏称他为“不务正业”。

在老上海的报刊史上,郑逸梅“补白大王”的美名可谓无人不晓,且一直相随。郑逸梅“补白”的特点在于一个“杂”字,这也是过去报人和副刊编辑的最大特点。“杂”者,广也,指作者写作领域的宽广与深厚,举凡金石书画、收藏鉴赏、版本目录、诗文辞翰、戏剧电影、美食烹饪、名胜古迹、花鸟虫鱼等,都可娓娓道来,讲得丝丝入扣。郑老一生勤于著述,除“文革”时被斥为“称王道霸”无端遭批而沉寂外,至上世纪80年代初,晚岁的郑老又一次走红,其老笔纷披,左右驰骋,九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写下了如《南社丛谈》《艺林散叶》《尺牍丛话》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著作,累计达数千万文字。可谓是“补白大王”再度“称王”,他手上的一支健笔,真是横扫了将近一个世纪。 □管继平

■人物春秋

近代博览会初兴之时的中国留影



1867年世博会中国区

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隆重开幕,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自19世纪下半叶起,近代世界性博览会逐步成熟,中国也以开放的身影参与其中,同时也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在目前尚可寻获的19、20世纪西方画报档案中,仍能看到当时的中国在世界博览会上的留影。

博览会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商人的定期市集。最初的市集只是涉及经济贸易领域。到了19世纪,随着商业活动在欧洲的地位不断提升,市集的规模逐渐扩大,商品交易的种类和参与的人员愈来愈多,影响范围也愈来愈大,涉及经济、艺术、人文和生活理想等丰富面向。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颇具规模的大型市集便逐步成熟,从而催生了博览会。

近代最早的大型博览会是由英国举办的。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成为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这届博览会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展期为1851年5月1日到10月11日,主要的展览内容是世界文化与工业科技的成果。

近代博览会初兴之时,中国便参与其中。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对很多外国人而言,一直是神秘而丰富多彩的。没有接触过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背景下,博览会中的中国馆正好成为了外国人了解当时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可以说,历届世博会中的中国留影,不但反映了中国晚清社会的发展历程,也揭示了西方人对中国这个神秘东方大国逐步了解、态度随之转变的过程。

1867年举办的巴黎世博会,较之前的博览会有了新的调整和突破,已经具备了现代世博会的雏形。在此届巴黎世博会中,来自中国广东的书生王韬,远渡重洋到达法国马赛,游历了世博会主会场。他因此被誉为“中国睁眼看世博第一人"。

1878年5月20日至1878年11月10日,新一届世界博览会在法国巴黎隆重举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届巴黎世博会中,作为参展国之一的中国也在展馆街上设立了中国馆,并认真进行了布展。这引起了法国各界的关注。当时法国报刊

1878年世博会上正在建造中国馆的清朝工人

上刊载了中国馆的建设情况:在左侧的众多展馆之中,中国馆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次,清帝国一改在过去几届世博会上的做法,不再从巴黎或伦敦的仓库、商店里随便收集几件算得上真品的东西代表清帝国参展。这次所有的展品都从清帝国直接运送过来。皇帝特意从北京指派了技艺高超的建筑师和工匠来建造中国馆。

看着这些能工巧匠手拿圆规、锯条或是刨子仔细地测量、绘图、校正,快速地建造一座造型优美又典雅精致的宝塔,真是再有趣不过了。中国馆的设计理念借鉴了中国建筑设计中最精巧绝伦的部分。

1885年的安特卫普世博会也单独设立了中国馆,欧洲人对此颇有兴趣。当时的法国报刊将之与1878年法国巴黎世博会做了对比,并谈了对清朝社会的一些看法。报道中还刊登了一张展示北京风貌的插图,名为“清朝景象”。

1900年4月,巴黎万国博览会开幕,这是巴黎第四次举办博览会,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九届博览会。展会期间,参观者达4000万人,多于历届博览会。这次被称为“世纪之总”的博览会,展示了西方社会在整个19世纪的技术成就。此外,中国馆也建设得颇为壮观,给当时的西方人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中国这一神秘的东方国家。据统计,当时有60%的欧洲人专门为中国馆而来。由于参观中国馆的人太多,世博会结束时,中国馆的建筑有些地方已经严重受损。中国馆里的展品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晚清人民的生活状况,给人一种身在中国的感觉。这一届博览会中,中国馆里有不少老照片留存下来。很多外国人在看了展览之后慕名前往中国参观。 □赵省伟

深入学习贯彻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紧急征订: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学习辅导丛书

1.《中国工会章程》(单行本) 定价10元
2.《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定价28元
3.《中国工会十七大报告学习问答》定价28元
4.《中国工会十七大章程修正案学习问答》定价38元
5.《中国工会十七大文件汇编》定价26元
6.《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学习笔记》定价38元
总 定 价:168.00元
作 者:中华全国总工会 编 出 版 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办公室陕西工作站
联 系 人:王老师 13892848206
联系地址:陕西工运学院工会干部培训中心205室